

名也小，其取类也大。”（孔子语，见《易·繁辞下传》）如就在《论语·子罕》同一篇中：“子曰：苗而不秀者有矣夫！秀而不实者有矣夫！”“岁寒然后知松柏之后凋也！”难道孔子是在指苗和松柏说的吗？又如“风乍起，吹皱一池春水。”何尝不是言在水而意在水之外呢？正因为孔子似乎在漫不经心地说着人们常见的“水流不息”的自然现象，而实际上却是言近旨远，“勉人入学不已”（这也是程子解释“逝者如斯夫”的话，见朱熹《论语章句集注》），这才被他的弟子们记载下来，从而引起了人们思想上的共鸣。以至后来的学者、诗人，常常从它引起对流水的许多联想，并从不同的方面阐发自己的理解和感受，借以抒写自己的情怀。

唐温庭筠《苏武庙》：“茂陵不见封侯印，空向秋波哭逝川。”这里的“逝川”就是“流水”。“向秋波哭流水”，不就是“逝者如斯夫”的意思么？

有人说：“这‘逝者如斯夫’中的‘斯’才是指‘流水’，后来的‘逝川’也是从‘斯’来的。不能用‘逝川’来证明为‘逝者’，从而证明‘逝者’为‘流水’。”我认为，将“斯”解释为“这样，也仍然指的是‘流水’，这是一致的，问题在于‘逝者’。如上文所说，“逝者”的外延，既然包括“流水”，为什么不能根据“子在川上”那样特定的环境，直接解释为“流水”呢？而“逝”字本有“流逝”的意义，将“逝者”解释为“流水”，无论从字面和含义来看，都是合乎逻辑的。当然，如果离开了特定的环境，将“逝者”解释为“流水”那就欠妥了。宋陆游《望江道中》一诗，开头的两句：“吾道非耶来旷野，江涛如此去何之？”这两句诗都与孔子有关。前一句是孔子在陈绝粮时与弟子的对话（见史记·孔子世家），后一句即是“逝者如斯夫”的翻版，陆游也是直将“逝者如斯”写成“江涛如此”了。

将“逝者如斯夫”解释成“一切事物的流逝就象这流水一样啊！”语言平淡，无弦外之音，无人深省的“潜台词”，索然寡味，犹如无毛之皮发一览无余；如解释成“流水象这样地流啊！”那就于“微言”中见其“大义”，言近旨远，耐人讽味，犹如有毛之皮，文章天成，寓于自然后会于心。虎豹之皮美于犬羊之皮，而“虎豹之鞞”则“犹犬羊之鞞”了。孔子十分重视语言的作用，曾说过：“言之无文，行而不远”（《左传·襄公二十五年》）又曾教导他的儿子孔鲤说：“不学诗，无以言。”（《论语·季氏》）从“语言美”这一角

度出发，前一种解释只是陈述性的语言，后一种解释则是意在言外的文学语言，所以后一种解释优于前一种解释。而言简意赅、含蓄隽永、言近旨远、寄托遥深，正是《论语》语言上的特色。故不揣谫陋，成此短文，聊备一说。不当之处，请同志们指正！

李 陵 辩

沈 淦 钱 健

近来谈了好几篇评论李陵的文章，对李陵的投降问题及功过问题展开了讨论。我们也想对这些问题谈一些粗浅的见解，兼和于汇魁同志商榷。（其文《也谈李陵败降的责任在谁》载《历史知识》1981年第4期，以下简称《于文》）。

李陵是西汉将领，战败后投降了匈奴。这种变节行为当然是错误的。但司马迁根据他在战场上英勇奋战、立有大功、因无援而败的具体情状，再结合李陵平时的为人，得出他的投降是权宜之计，是“欲得其当而报汉”（司马迁《报任安书》）的结论，则是可信的。而《于文》则认为司马迁辨护失当：

“但是，正象司马迁自己承认的那样，他和李陵，虽然‘俱居门下’，但‘素非相善也，趣舍异路，未尝衔杯酒接殷勤之欢。’所以不可能了解得很深。他称道李陵‘事亲孝，与士信、临财廉、取与义、分别有让，恭俭下人。常思奋不顾身，以徇国家之急’，‘有国土之风’等等，只不过是一些个人感觉。凭感觉的东西确认李陵的投降是‘权宜之计’，显然是不恰当的……李陵归汉的念头从投降之初就断绝了。”

这样看来，能否对一个人作出恰当的评价，关键在于评价者与被评价者的私交。私交不深=了解不深；了解不深，自然评价不当。这种看法是不对的，不符合历史唯物主义原则。《于文》又说：“其实，李陵从投降起，就已经把他的家族抛弃了。李陵身为汉将，对汉法是熟知的；投降匈奴定遭灭门，他是清清楚楚的，但他还是投降了。这就很有力的说明，李陵的行动并不系于他的家族的安危……李陵归汉的念头从投降之初就断绝了，并不是汉武帝杀了他的全家以后逼迫出来的。”

“投降匈奴，定遭灭门”么？那么李陵的全家早在李陵败降之初就该“伏诛”了，何以要等到一年多后，在汉武帝听到“李陵教单于为兵以备汉军”（《汉书·李广苏建传》）的谣传时呢？在此之前，汉武帝又为什么“悔（李）陵无救……遣固杆将军公孙敖将兵深入匈奴迎陵（《汉书·李广苏建传》）”呢？当时的另一位汉将泥野侯赵破奴，曾率军二万击匈奴，结果全军覆没，自己也被活捉。十年后当他要返汉廷时，“天子客遇之”（《汉书·李广苏建传》），并没有听说他家属被诛一事。正因为如此，在李陵被俘的前夜，其部下就有人以赵破奴为例，劝他暂归匈奴，以后再找机会逃归汉朝。

《于文》认为投降是李陵选择的一条“死中求生，苦中求乐，祸中求福”的道路。那么，投降后的李陵，本已无丧命之虞了，可是当他得知自己全家被诛的原因，是汉武帝轻信了公孙敖的谗言。实际上“教单于为兵以备汉军”的是另一汉降将李绪，就不顾一切地刺杀了正为单于宠信的李绪。为此，单于的母亲要杀李陵，只是因为“单于壮陵”（《汉书·李广苏建传》），才使他侥幸保全了性命。试问，李陵既已“死中求生”，何必又“生中求死”？

李陵败降后，单于赐女封王，恩宠有加。相形之下，汉朝在李陵孤军苦战时，并未及时派兵增援；败降后又族灭其家。李陵的祖父飞将军李广，叔父关内侯李敢，都曾为汉朝立下不朽战功，结果却相继死于非命。汉朝对李陵，对李氏家族，是算得上刻薄寡恩的。尽管如此，李陵对汉王朝还是一直充满感情的。当李陵的好友，被匈奴扣留十九年的汉使苏武归国时，李陵置酒为他作贺。《汉书》载：

“陵起舞，歌曰：‘径万里兮度沙幕，为君将兮奋匈奴。路穷绝兮失刀摧，士众灭兮名已隳。老母已死，虽欲报恩将安归！’陵泣下数行，固与武决。”

此时，李陵已留居匈奴十八年了。但他仍然想到当年“为君将兮奋匈奴”的悲壮场景，念念不忘汉朝，痛伤自己“欲报恩”而不能的处境。是的，李陵确曾迫于单于之命去劝降过苏武。但是当他“见

其至诚，喟然叹曰：‘嗟乎，义士！陵与卫律之罪上通于天。’固泣下沾衿，与武决去。”（《汉书·李广苏建传》）他对苏武钦佩之至，并“使其妻赐武牛羊数十头。”（《汉书·李广苏建传》）接济苏武。

我们说李陵并非真心投降，就是因为他在匈奴二十几年，没有做过一件不利于汉朝的具体事情。难怪当时的有识之士，都没有将李陵当作叛徒、汉奸来对待。列宁曾经说过：要善于区别这样两种人：一种人把钱交给强盗，为的是加入强盗团伙，分取赃物；另一种人也把钱交给强盗，为的是减少强盗对自己的伤害，以便将来能审判强盗，枪毙强盗。李陵显然不是列宁所说的前一种人，说他是叛徒也是不公平的。

在西汉与匈奴的那场战斗中，“李陵提步卒不满五千，深战戎马之地，足历王庭，垂饵虎口，横挑强胡，仰亿万之师，与单于连战十有余日，所杀过当。虏救死扶伤不给，旃裘之君长咸震怖。乃悉征其左右贤王，举引弓之民，一国共攻而围之。转斗千里，矢尽道穷，救兵不至，士卒死伤如积。然陵一呼劳军，士无不起，躬自流涕，沫血饮泣，更张空拳，冒白刃，北向争死敌者。”（司马迁《报任安书》）

李陵确实是一名杰出的将领，在战场上为汉王朝立下了不朽的功勋。司马迁赞他“虽古之名将，不能过也。”“功亦足以暴于天下”（司马迁《报任安书》）是毫不过份的。投降匈奴后，他刺杀了深受单于宠幸的叛徒李绪，接济了陷于穷厄困境之中的汉使苏武，客观上也为汉朝立了功。《于文》说“李陵的功大，罪过更大。”我们不知道，李陵比功劳“更大”的“罪过”在哪里？

我们认为，李陵是一个颇为复杂的历史人物。对于他的功过问题，应当根据当时的具体情况，实事求是地加以分析、评定，既要看到他败降失节的一面，又要看到他立下战功和念念不忘报汉的一面。总的说来，他是一个瑕瑜互见，功大于过的历史人物。